

历史的证伪

——波普历史非决定论思想研究

赵庆元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的证伪:波普历史非决定论思想研究/赵庆元著.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8.8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第19辑)

ISBN 978-7-80250-036-5

I. 历…

II. 赵…

III. 波普尔, K. (1902~1994)—历史哲学—研究

IV. I2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3784 号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100101

电 话:64924716(发行部) 64963101(邮 购)

64924880(总编室) 64963107(一编部)

网 址:www.zgyscbs.cn

E-mail: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156 印张

字 数 2340 千字

定 价 390.00 元(全 16 册) ISBN 978-7-80250-036-5/B·180



2.3.2	逻辑支柱:科学知识增长的非决定论.....	(44)
2.3.3	逻辑结论:“乌托邦”工程批判与科学的社会渐进工程	(49)
第三章	波普历史非决定论思想批判.....	(54)
3.1	批判之一:历史学的学科性质.....	(54)
3.1.1	“个别论”的历史演变及对历史哲学的影响	(55)
3.1.2	历史的个别与一般	(61)
3.1.3	历史学学科的分立与统一	(73)
3.2	批判之二:历史主义与历史预测.....	(81)
3.2.1	科学理论的预测功能及唯物史观对历史预测的态度	(81)
3.2.2	(自然)科学理论预测的本体论与方法论根据	(84)
3.2.3	历史预测在唯物史观中的实现	(93)
3.2.4	历史科学中自然科学实证方法的合法性 ...	(103)
3.3	批判之三:科学知识增长的非决定论.....	(113)
3.3.1	“特里桑的 Shandy 酒之悖论”中的循环论证	(113)
3.3.2	证伪主义与经验证实	(122)
3.3.3	科学知识增长的革命与渐进	(135)
3.4	批判之四:科学知识决定论及其理论实质.....	(142)
3.4.1	意志的绝对自由是可能的吗	(142)
3.4.2	科学知识的自主性与依存性	(150)
3.4.3	科学知识决定论及其唯心主义实质	(162)
3.5	批判的结论:必然与自由的辩证统一.....	(169)

第四章 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技术.....	(176)
4.1 关于科学知识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问题	(177)
4.1.1 波普“科学知识决定论”的现实底蕴	(177)
4.1.2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科学技术作用问题上的 认识与局限	(181)
4.1.3 关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关系问题	(186)
4.2 关于科学文化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的 地位问题	(192)
4.2.1 从科学知识到科学文化:科学作为历史 哲学范畴的诞生	(193)
4.2.2 科学文化在波普历史非决定论思想中的 地位的理论启示	(196)
4.2.3 文化及科学文化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体系中的逻辑定位	(205)
4.3 马克思主义现代科学观的确立及其现实意义	(209)
4.3.1 科学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关联	(210)
4.3.2 从现代物理科学来看现代科学观的特点 ...	(215)
4.3.3 迎接挑战: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现代转型 ...	(223)
第五章 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哲学.....	(228)
5.1 历史必然性是否存在	(229)
5.1.1 从波普的历史非决定论思想看历史唯物 主义之历史本体论的固化	(229)
5.1.2 历史唯物主义之历史本体论的变异与 反思	(234)
5.1.3 历史唯物主义之经济必然性及其正确 理解	(245)



5.2	历史必然性能否认识	(254)
5.2.1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及 “认识论屏蔽”的形成	(254)
5.2.2	“认识论屏蔽”的历史演变及其实质	(260)
5.2.3	立足历史实践,破解历史哲学的“认识论 屏蔽”	(268)
5.3	历史必然性如何利用	(275)
5.3.1	从规律与趋向的逻辑区分到初始条件的 “变”与“不变”	(276)
5.3.2	加强对人类社会发展初始条件及其变化的 研究	(285)
5.3.3	“意识暗箱”问题的实质及其破解	(289)
	后 记	(298)



第一章 前言

波普是 20 世纪最有名望、最有影响的科学哲学家之一，也是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科学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两栖身份的融合，使波普的历史哲学具有了与其他的历史哲学家的思想迥然相异的特点，这就是它的更为鲜明的来自于自然科学发展的实证说明和基于自然科学反思的哲学阐释。波普历史哲学的这一特点与我们通过研究波普的历史哲学思想所要达到的丰富和完善，并通过丰富和完善巩固历史唯物主义之历史决定论思想的目的规定了我们的批判性研究的逻辑指向，这就是他的历史非决定论思想。在这里，我们首先对波普的生平、哲学思想与批判波普历史非决定论思想的时代价值做一简要的说明。

1.1 波普的生平与哲学思想

卡尔·莱芒德·波普(Karl Raimund Popper)1902 年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律师家庭。他的家族有犹太血统，但皈依了基督教。父亲是律师，但爱好文学与哲学，并积极从事社会事务，波普深受他的影响。母亲则激发了他对音乐的兴趣，在她的影响下，波普曾一度



想做音乐家，并在博士考试时将音乐史作为第二科目。据波普自述，他从12岁时起开始阅读父亲收藏的哲学书籍，先后阅读了康德、笛卡儿、斯宾诺莎等哲学家的著作，并开始与父亲一起讨论哲学问题。1916年波普进入维也纳大学做旁听生，并于1928年获维也纳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维也纳大学的学习生活是波普哲学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波普建立了与维也纳学派及其逻辑实证主义之间的精神联系。维也纳学派又称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因为维也纳是其发源地而得名，创始人与领导人为石里克（Moritz Schlick, 1882—1936）。维也纳学派的思想来源主要是马赫、杜恒、彭加勒以及孔德、密尔和休谟等科学哲学的创始者，他们所关心的大多是科学哲学问题，并力图用语言分析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因此，逻辑实证主义既是科学哲学的第一个成熟学派，又是早期分析哲学的重要流派。波普没有参加维也纳学派的活动，但在思想上却与他们始终保持着一种若离若即的关系，尤其是与他们中的一些成员如费格尔、卡尔那普等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并深受其思想的影响。波普的证伪主义可以看作是对逻辑实证主义极端证实原则的理论反拨。

1919年是爱因斯坦相对论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爱因斯坦于1915年根据相对论原理提出光线弯曲的预言，并计算出光线在太阳附近偏斜的曲率。1919年英国爱丁顿爵士的考察队利用日全食的机会观察到太阳引力场的光线轨迹，结果与爱因斯坦的预言相符合；而爱因斯坦在关于相对论的演讲中曾坦言，即使预言被观察所证实，也不意味着自己的理论就是证实了的真理；而一旦观测与自己的预言不符，那就证明自己的理论是错误的。爱因斯坦的这些观点对波普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说：“爱因斯坦的革命深深地影响了我的观点：我觉得没有爱因斯坦，我就永远得不出我的这些观点。我认为，科学是由尝试性的、假设的、猜测的理论所组成，这是科学的基本原则。这意味着，任何理论不管曾获得何等的成功，也不管曾经受过何等严格的检验，都是可以推翻的。……爱因斯坦给



我的印象最深刻的一点也许是：爱因斯坦对他自己的理论具有高度的批判精神，这不仅表现在他试图发现并指出它们的局限性，而且也表现在他对所提出的每一个理论都试图找出，他将在什么条件下把这一理论看作被实验所驳倒。”^①在历史观方面，学生时代的波普则经受了后来所批判的历史主义的熏陶与洗礼。波普自述说：“我在维也纳做学生的时候，左翼和右翼的气氛都是强烈地历史主义的。‘历史是在我们这一边’这个口号，你可以从国社党（及其有关团体）和社会民主党（我和我的朋友都属于它）两方面同样地听到。而‘科学社会主义’则是对社会主义必将到来的科学证明。”^②波普自己还曾一度是支持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并倾向于社会主义思想，只是在1919年他亲眼目睹一群青年学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与警察发生流血冲突，才产生了对阶级斗争理论和策略的厌恶，并最终脱离共产党转向反马克思主义立场。波普后来承认，如果事实并未表明社会主义理想与个人自由是水火不相容的话，他还是会乐于追求社会主义的理想。尽管如此，历史主义的社会思潮还是给波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开始对历史主义理论的研究感到兴趣。青年学生时代逻辑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思潮的双重影响不仅决定性地影响了波普毕生哲学研究的兴趣指向，这就是科学哲学和历史哲学，而且还使科学哲学和历史哲学在他的证伪主义基础上交相渗透、相辅相成而形成鲜明的个性特征。1934年波普的第一部科学哲学著作《研究的逻辑》列在石里克、弗兰克主编的《科学世界观论文集》丛书出版，《研究的逻辑》的出版树立了波普作为重要哲学家和科学理论家的国际声望。在这本书中，波普与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形成了他的批判理性主义的观点，以后发表的著作如

① 波普：《科学知识进化论》，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1—52页。

② 转引自波普：《历史主义的贫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中译本序第12页。



《科学发现的逻辑》(1959,《研究的逻辑》一书的英译本和增订本)、《猜想与反驳》(1963)、《客观知识》(1972)、《自我及其脑》(1977)等著作则是对其批判理性主义科学哲学思想的全面阐发和引申。

历史哲学研究是波普另一个重要的理论视点。1936年,波普以《历史主义的贫困》为题宣读了两篇论文:第一篇是在布鲁塞尔的一个哲学讨论会上,第二篇是在伦敦由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主持的一个讲习班上,1957年这两篇论文以《历史主义的贫困》单行本的形式重新发表。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一书中,波普从以下信仰中推导出他致力于批判的极权主义政治观,这种信仰认为,人们能够通过揭示绝对有效的“历史规律”来预言历史的进程,控制和计划社会的发展,波普将这一信仰归结为以“本质主义”为基础的历史主义予以批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普移居新西兰,在坎特伯雷大学任教。在此期间,波普继续从事他的批判历史主义的研究,其结果就是两卷本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的出版。在这部最重要的历史哲学著作中,波普系统地考察了从柏拉图到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理论,并将法西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作为最重要的历史主义现象加以猛烈批判。《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由于迎合了二战之后东西方“冷战”的政治格局和对法西斯主义思想批判的形势而多次赢得学术界和政治界大奖。^①

1946年,波普移居英国,在伦敦大学经济学院任教,1949年被任命为逻辑和科学方法讲座教授,直到1969年退休。在此期间,政治哲学在波普哲学研究中的地位“又有所退后”,而科学哲学重又成为波普哲学研究的重心。在这一时期,波普陆续发表了一些重要的科学哲学著作,进一步发展了在《研究的逻辑》一书中的方法和思路。特别是1967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的第三届国际逻辑、方法论和科学哲学会议上,波普提出了“三个世界”的著名学说,为他的科学知

^① 参阅赵敦华:《当代英美哲学举要》,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65页。



识增长理论给予了本体论上的解释。但在政治上,波普也并未完全淡出公众关注的视野。1968年爆发了以法国“五月风暴”为标志,几乎席卷所有发达国家的青年学生运动。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中,马克思主义推翻现存制度的呼声震于耳,人们推崇赫尔伯特·马尔库塞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说,马尔库塞在公开场合把西方民主的自由主义的宽容解释为“令人压抑的”,因为它通过毫无目的的批判性追问可能性使得通往乌托邦社会的真实道路失去作用。波普在这个时候一跃而升为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的对极,并与马尔库塞进行了无数次公开的交锋和辩论,在这种交锋和辩论中继续发展他的“批判的理性主义”政治理论。^①

退休之后的波普居住在伦敦郊区的潘思镇,继续他理论思维的无穷探索。当1994年9月17日波普以92岁高龄逝世时,他留下了丰富的关于科学哲学与历史哲学的遗产,这些遗产直到今天都还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

在《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书的序言中,波普明确指出:“认识论的中心问题一直是也仍然是知识的增长问题。而研究知识的增长最好莫过于研究科学知识的增长。”^②在波普之前的逻辑实证主义继承了英国近代的经验主义传统,一方面将科学知识看作是通过归纳方法从感性经验中确立起来并得到经验证实的真命题,将科学知识的发展看作是由这些真命题所构成的理论的叠加或累积,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建立了具有决定论意义的关于科学知识增长的归纳主义累进模式;另一方面对科学方法论的理解则拘泥于用形式逻辑的工具对现成知识——概念、命题和理论——作静态的纯逻辑的分析。因此,逻辑实证主义最终只是建立了关于科学证明的现代逻辑方法论。针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波普通过《研究的逻辑》、《猜想与反驳:科学

① 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② 波普:《科学知识进化论》,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页。



知识的增长》等一系列科学哲学著作，建立起一套呈严密理论形态的证伪主义科学方法论体系，这个科学方法论体系将科学知识看作是永远不能被证实但却可以被证伪的猜测或假说，将科学知识的增长看作是表现为猜测或假说的理论不断地被证伪，然后再提出新的逼真度更高的猜测和假说的“不断革命”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波普建立起一套具有鲜明非决定论意蕴而与归纳主义累进模式尖锐对立的证伪主义科学知识增长模式。而与这种非决定论的科学知识增长模式相对应的科学方法论则是以形式逻辑假言判断否定后件式演绎推理为逻辑依据的“猜测—反驳”方法。波普将这样一套与逻辑实证主义完全不同的科学哲学观称为“批判理性主义”。当然，“批判理性主义”的称谓并不意味着波普完全抛弃了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立场而回归到传统的唯理主义立场，实质上，在波普的科学哲学观中，作为猜测和假说的科学知识虽然不是来自于经验而是来自于柏格森生命哲学意义上的“创造性的直觉”，^①但却必须通过经验才能证伪，这就表明波普所理解的科学知识仍然有遗传于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基因。理性主义在这里仅仅表明，它比逻辑实证主义更强调“科学的人性方面”，也就是说，科学是可以犯错误的，而只有通过批判才能“导致纠正错误，从而使我们更接近真理”，因为在波普看来，不迷信、不盲从的批判精神与探索精神才是理性的真正精髓。波普科学哲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从“批判理性主义”出发，建立了关于科学发现的证伪主义方法论体系，由此把逻辑实证主义开创的科学方法论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借助于这种证伪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体系，波普自己甚至曾得意地宣称是他扼杀了逻辑实证主义。尽管证伪主义其实“并不那么锐利，不足于置逻辑实证主义于死地”^②，波普还是凭借其独树一帜的证伪主义打破了逻辑实证主义一枝独秀

① 波普：《科学知识进化论》，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0页。

② 洪谦：《逻辑经验主义文集》，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31页。



的局面,开创了科学哲学的证伪主义时代。

波普的主要活动领域是科学哲学,但他并未将证伪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局限于科学哲学领域,而是将其创造性地运用于哲学的其他分支领域,从而形成了以科学哲学为中心和基础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和历史观的完整严密的哲学理论体系,其中,集中体现在《历史主义的贫困》、《公开社会及其敌人》等历史哲学著作中、在其他科学哲学著作中“也有相当的反映”的历史哲学思想是波普哲学体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构件。

波普的历史哲学思想大致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由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历史价值论和历史方法论四个理论构件所构成的完整系统。历史本体论即以历史本体为研究对象,以揭示历史现象背后的客观历史规律为目的的历史哲学思想,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哲学思想的本体论上的基础。在历史哲学中,这一本体论基础有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论形态: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非决定论,两者分歧的焦点体现在是否承认历史本体的客观存在,是否承认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具有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波普那里,以否认客观历史的真实存在,否认人类历史具有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为核心的历史非决定论思想提供了其历史哲学思想的本体论上的基础。如果我们将波普的历史哲学思想看作是其非决定论的科学哲学思想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创造性的运用,那么极其明显的是,他的历史非决定论思想正是以其科学知识的非决定论思想为理论原型的。波普历史哲学的其他理论构件,如属于历史认识论的关于历史学学科性质上的“个别论”或“特殊论”,属于历史价值论的关于“历史没有意义,但我们能够给予它以意义”^①的“给予论”,属于历史方法论的关于证伪主义的猜测—反驳的原则方法和“境况分析”与“覆盖率解释模式”的历史解释方法等等,或多或少都是以历史非决定论思想为

^① 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7页。



本体论上的支撑构建起来的。波普历史哲学思想的主要批判对象是被波普称为历史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而历史主义之所以作为波普历史哲学的主要批判对象,是由于它内涵着与波普科学哲学和历史哲学中的非决定论思想尖锐对立的决定论思想并由此造成了它们之间的尖锐对立。因此,波普历史哲学思想的根本特征是非决定论的;另一方面,波普的历史哲学思想又主要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攻击和批判中展开的,因为在波普的理解中,“主张社会的经济组织、我们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的组织,对一切社会制度、尤其是对它们的历史发展而言是基本的”^①经济的历史唯物主义是“迄今理论中最纯粹、影响最广泛、因而最危险的历史决定论的形式”,是历史主义的高级发展阶段。因此,波普历史哲学的基本的意识形态立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强烈的意识形态批判立场和依托于科学哲学的批判背景使波普的历史哲学成为了当代西方哲学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危害最烈的哲学思潮之一。《马克思传》的作者伯林说,波普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学说的最严格、最难对付的批评”。英国哲学评论家麦基甚至说:“我不明白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在读了波普对马克思的批判之后,如何还能继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②由此可见,不论是基本的哲学理念还是其鲜明的价值趋向,波普历史哲学思想的灵魂和主旨都是他的历史非决定论思想,而这也意味着只有把握住这一灵魂和主旨才能正确地解读波普的历史哲学思想。因此,我们对波普历史哲学思想的批判性研究就必然地要以他的历史非决定论思想为鹄的。

虽然波普主要是一个科学哲学家,他的成就也主要体现在科学哲学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历史哲学可以在我们的理论研究中被轻视或忽略,这不仅是因为历史哲学思想是波普的证伪主义在科

① 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5页。

② 转引自赵敦华:《当代英美哲学举要》,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320页。



学哲学以外的领域的最为重要的运用和扩展,因而研究其历史哲学思想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其科学哲学思想的理论内涵,而且还因为,历史哲学作为波普哲学思想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论构件具有其科学哲学思想所未能涵盖的独特的理论和实践上的研究价值。当然,这种独特的理论和实践上的研究价值如果脱离了当前历史唯物主义完善和发展的理论目的是不能理解的。

1.2 波普历史非决定论思想研究的时代价值

1962年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1922—1996)的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出版。《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出版作为“学术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宣告了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的诞生,同时也宣告了在反驳逻辑实证主义中形成的证伪主义科学哲学在经过了从波普的“朴素的证伪主义”到拉卡托斯的“精致的证伪主义”之后,终于被科学哲学的新的历史发展所扬弃。20世纪70、80年代,历史主义派别又逐渐被普特南(Hilary Putnam,1926—)、夏皮尔(Dudley Shapere,1928—)的科学实在论所取代,波普的证伪主义更是被远远地遗弃在科学哲学历史的尘埃之中。同样,历史哲学也绝没有止步于波普在其中显其身手的历史认识论面前,它也同科学哲学一样在外部的挑战和内部的纷争中艰难地前行,并逐渐被一种新的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叙述主义的历史哲学”所取代,海登·怀特(Hayden White)以后现代主义手法写成的《元历史: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于1973年的出版则是这种新的历史哲学诞生的标志。叙述主义的历史哲学专注于历史著述的叙述语言分析,反映了历史哲学“语言学的转向”的开始。就在我国的影响而言,波普的哲学思想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随着改革开放之后各种西方学术思潮的涌入传入我国的,其证伪主义的科学哲学思想



也由于我国拨乱反正的政治格局而迅速在知识界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中扩散并产生了热烈而持久的回响,而对最早传入我国的波普和库恩的科学哲学思想的介绍和讨论甚至直接催生了我国真正的科学哲学学科的诞生。但是,在经过最初的盲目引进的热潮之后,波普的哲学思想逐渐在更趋理性的反思和批判中淡出人们的思想视野,这种隐隐的淡出甚至还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这样的一种趋向: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在国内,科学哲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的研究由于许多大师级人物的去世而在近些年都已显得“相对冷清”了^①。因此,一个必须直面的问题是,对波普历史非决定论思想的研究是否还具有时代的价值。

我认为,在今天加强对波普历史非决定论思想的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历史必然性或历史规律性的问题仍然是历史哲学最为重要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历史观的基本问题。这种认识不能说是错误的,但相对于历史观或历史哲学这个稍微“形下”的领域来说则显得过于抽象和空泛。无论是反思历史哲学自维科以来的历史发展及考察历史哲学在今天的现状,还是审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构建的前景,我们都很容易发现,历史必然性与人的主体性(或人的自由)的关系问题才是全部历史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因为正是这一问题才贯穿历史哲学发展过程的始终,并在更为根本的始基上决定历史哲学具体形态的性质、结构和样式。而历史必然性或历史规律性问题无疑又是历史哲学这一基本问题中最为重要的一极,因为人的主体性或人的自由问题常常只是在历史必然性或历史规律性问题的辐射圈之内才获得应有的关注并得到应有的说明。正是由于这一点,历史必然性或历史规律性问题构成了历史哲学发展史上形形色色历史哲学形态首先关注并

^① 参阅刘大椿:《科学哲学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页。



试图加以解决的问题。围绕着历史必然性的问题,在历史哲学的发展史上一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非决定论思想的论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后又交织着辩证的历史决定论与机械的历史决定论之间的论争。但是不能不承认的是,在今天,历史必然性或历史规律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完美的解决,历史唯物主义虽然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成功的进展,但却始终未能在西方的历史非决定论者中间获得像自然科学那样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不仅如此,否认历史必然性或历史规律性的历史非决定论思想在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中猛烈的回潮,几近使最坚定的历史决定论者的马克思主义在各种新问题的困扰中丧失其原有的立场。所有这些都说明历史必然性与人的主体性的关系问题以及作为这一问题最重要的一极的历史必然性问题在历史哲学及其历史发展中的实质与核心地位,说明了它对于任何历史哲学形态的不可避免性,也说明了在这一关键问题上理论斗争的激烈态势,而以波普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历史非决定论思想只不过表达了它们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因此,如果历史唯物主义不能表明其鲜明的态度和立场,那么,这一问题就可能成为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粉墨登场的理论策源地。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决不能回避而是必须直面这一问题。然而,历史唯物主义对这一问题的直面也就是意味着它必须时刻关注这一问题的辩证发展以及由此催生的新的理论形态,它必须在对不断发展着的历史哲学基本问题的关照、解析和批判中阐发和固化自己的理论观点。

其次,历史非决定论思想仍然是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必须加以关注的主流趋向。自1874年布莱德雷《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开启历史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以来,到20世纪上半期,以对历史认识的分析为主要关注对象的分析与批判的历史哲学成为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显学,并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历史哲学学科;而随着分析与批判的历史哲学显学地位的逐渐确立,历史非决定论思想也逐渐成